

書評

考古人類學刊・第 98 期・頁 121-128・2023

DOI: 10.6152/jaa.202306_(98).0005

異質「永續」敘事：讀《借土養命：從雲南到金三角， 從毒品到永續農業，一個泰北華人社區的民族誌》

何浩慈 Hao-tzu Ho

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

本書原以英文出版，成書於 2010 年，後由作者親自譯作中文，描繪泰緬邊境華人離散社群聚落，書中化名為「美弘村」。美弘村村民為國共內戰時期國民政府部隊及其親眷，戰後始由雲南省移居泰國北部清邁省，與海拔較低區域之泰人、撣人、甲良人，及海拔較高區域傈僳族、佤族、苗族、瑤族聚居或為鄰。此批武裝移民雖與其原鄉多元族群血脈相承，卻秉持反共意識，並以傳統中華儒家文化守護者自許，傾向否認自身非漢族血統。作者解釋，美弘村民對於「華人性」文化標籤之認可，與其來自中國西南多族群環境有關。對村民而言，以血統區分民族屬性乃至身分的「民族國家」，是與日常生活無涉、遙遠的政治範疇；儒家以漢化程度為標準、大同思想為依歸之觀點，反而更符合雲南離散人群現實需求。其生活世界建立於想像中的「中華文化」，凍結時空中，創造出一座海外華人異域、文化堡壘。作者通稱此群體為「雲南華人」，書中詳盡說明了理據，此處不贅述。

本書對於海外華人、移民、永續農業、永續發展研究有顯著貢獻，且為多學科、跨國合作值得參考之典範。2002 年至 2005 年間，來自美國、泰國、中國之人類學、地理學、土壤學、影視學者，獲美國 Wenner-Gren 基金會及愛荷華州立大學研究獎助，至美弘村開展此研究計畫，並重理論與實踐。具體目標為尋找「永續農業」可能發展方向，以替代面臨危機之美國單一作物、大規模、商業化農業。危機諸如：農田表土流失、農藥汙染水源、農化產品惡臭影響在地生活品質、基改作物與化肥造成食物安全疑慮、農場因農具價格提高而收入減少、大規模生產制度仰賴石油造成資源耗竭、農村青年外移致使勞動力流失等。

本書作者黃樹民於研究計畫啟動前，曾受邀為愛荷華州立大學永續農業研究所學程開課。書中提及，當時學程團隊主要由農學家與土壤科學家組成，以民族誌資料為基礎之教材十分缺乏。但黃樹民認為，深入在地之民族誌調查有助理解實務運作，可為圍繞科技、環保論述的永續農業新典範提供客觀比較框架。回應此研究旨趣，本書

處理三個層次提問：第一層，美弘村山地農業生產系統對環境造成何種影響？第二層，文化、民族認同與實作，於雲南華人移居後之生態適應扮演何種角色？第三層，全球化情境下，離散人群複雜多變的認同可能有何深意？

黃樹民筆下的雲南華人，中國內戰後由故里撤退至緬甸、寮國、泰國邊界「金三角」地區，後受各國軍隊追擊，於緬甸、寮國北部流徙，1960 年代方至清邁山區熱帶叢林落腳。艱困環境與強大生存壓力下，第一代美弘村民投入鴉片、海洛因之生產、交易、國際走私，甚至因軍事化訓練而習於吃苦作戰，成為金三角地區組織販毒要角。胼手胝足的日子流淌而過，流亡部隊因協助泰國政府消滅泰北苗共組織，取得合法居留權；1981 年又獲官方認可，正式成為泰國公民。擁有公民身分後，逐漸發展山區果樹種植，新農業生產模式紓緩了生計問題。

作者藉長期田野調查察知，美弘村民之所以能發展出具適應力之農業生產模式，乃得利於傳承儒家社會關係與文化邏輯。由此延伸出的社會網絡、組織技術、處事風格，包括雲南帶來的山地耕作技術、農作選擇知識、貨幣信貸機制、儲蓄與投資敏銳度、與多族群往來並建立人際網絡之能力，使美弘村民順利擺脫對生產、販賣、走私毒品的依賴。然而，民族誌若只停在此處，便只刻劃了簡化、浪漫化圖像。作者指出，美弘村民之文化實踐恐怕為雙面刃，由此引出本書兩個鏗鏘有力的理論貢獻：「文化僵化」（原文為 *cultural petrification*）概念，以及對於「永續性」之反思性探討。

本書研究目的之一為分析美弘村農業生計「永續性」，並探討其是否可供更大尺度之「永續農業」、「永續發展」參考。「永續性」論辯中，有一類研究取徑詰問此概念出現脈絡與背後假設，可見於環境人類學、都市人類學、發展人類學、經濟人類學、乃至不同學科針對農業、城鄉發展等整合人文與生態系統之議題中。本書為此類文獻揮灑了濃墨重彩的一筆，增添歷史厚度、案例深度、地緣多樣性。

本書敘寫邏輯並非以「永續性」為價值標準，亦非先入為主推廣、讚揚美弘村生計模式，而是點出，「永續發展」是十分棘手的敘事。作者說明，支撐「永續發展」為倡議目標之論述於西方已興起數十年，包括有機農業、環境保護、社區糧食自給、農夫市集等，然其語意歧異，實踐上多所限制，且牽涉意識形態與價值判斷。作者點評，當下關注生態環境保育、文化多樣性、草根人民權利時，傾向設定「永續農業」為理想狀態，用以抗衡資本密集、企業獲利導向之農產業。然而，此類願景期待農民保護環境、維持生態多樣性，同時在人口增加、農地有限、氣候變遷多重壓力下兼顧產能，並於不同立場之利益相關人衝突夾縫中求生存。

異質「永續」敘事：讀《借土養命：從雲南到金三角，從毒品到永續農業，一個泰北華人社區的民族誌》

黃樹民於書中第二章點出，評估美弘村農業模式「永續性」之前，必須檢視何為評判標準？農民、本地人、國際環保倡議者、研究者、政府官員，誰有權決定？作者此處之思考，深刻回應「永續發展」為普世價值抑或服務特定群體、目的意識型態之辯論。環保、綠化成為國際發展新典範後，開發中 / 全球南方國家遭受已開發 / 全球北方國家檢討，認為其工業化、現代化、科技化途徑罔顧環境保育與社會正義。相關領域學者卻指出，此為全球北方國家之自保論述，用以淡化其於全球環境惡化共業中的角色，並將今後改革之責加諸於全球南方國家。筆者於另一篇論文中討論過，曾任聯合國、世界銀行、亞洲開發銀行、歐洲投資銀行、樂施會（Oxfam）等國際組織顧問之韓國發展經濟學家張夏準（Ha-joon Chang），以“kicking away the ladder”比喻全球北方國家策略：藉由剝削生態環境與弱勢群體而獲致經濟發展後，突然開始倡議環保、綠化，以全新標準限制全球南方國家不可循全球北方國家發展軌跡，要求南方國家發展同時，必須考量環境、社會正義，挹注資源降低碳排放量或其他污染源，並確保不耗竭天然資源。¹

為求討論聚焦、具體，黃樹民引述美國農學者 John E. Ikerd 對「永續農業」之定義，將本研究目標凝鍊為：「瞭解這些社會成員如何實現維護環境健康的『永恆價值』，藉此發展出能供應充足物質的生計模式，以及符合所有相關群體認可的正當性」（頁 55）。由此操作型定義切入，美弘村村民為實行耕作而改變土地利用方式，相比原始林相，造成一定程度土質惡化，且化肥、農藥難免污染溪流、飲用水，亦不時有農場主低價購買山地農場，或雇用當地較弱勢族群（如緬甸難民）作為廉價勞工。然而，美弘村民引進雲南原鄉農業知識，開發適合當地環境之經濟作物，運用華人財務管理技術及建立跨族群營銷網絡之能力，有效投資並管理勞動力與養護措施，因此得以由種植季節性、更耗費地力與產生污染之短期作物（如蔬菜、粟粟），轉為長期經營的山區熱帶水果業。對村民乃至泰北山區鄰近居民而言，創建出不至於全面破壞環境，但足以供給生計、改善生活之農業模式。

以美弘村案例為基礎，作者爬梳了「發展」概念自 1990 年代以來經受過之擁護與批判，認為儘管「發展」論述引發諸多爭議，若因有所疑慮便截斷所有貧困社群尋求生存、改善生活品質之機會，猶如「傾倒洗澡水時，將盆中的嬰兒一併倒入水溝」（頁 91）。作者指出，Ikerd 定義中的「永恆價值」為主觀名詞，適合特定時空之系統，在另一時空卻可能無法維持；符合某一社群之價值，亦不必然符合其他社群利益，甚至以犧牲其他社群為代價。更重要的問題是，社群界線及其需求是否被滿足應由誰判定，

仍是沒有簡單答案的問題。因而如書中評述，「永續性」之內容、意涵隨時間、空間、社會質地變動，完美的永續農業「理想型」，本就不存在於真實世界。若由此觀點重新檢視美弘村農業生計方式——「某些生產方法可能使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得到改善，並減輕生活困苦，同時又能保護自然環境，以及維持一定程度的社會文化自主性和尊嚴」（頁91）——作者判斷此案例可視為一種永續農業。

書中關於永續農業之探討，若將尺度拉大、層次拉高，對全球化、民族主義、民族國家相關之人類學知識，亦提供了洞見。第四章娓娓點出美弘村內部矛盾，輕手輕腳地向讀者揭示，泰北雲南華人「社會」並非共享文化特質與認同之集合體。第一代移民藉由其認定之儒家思想慣習，創造出想像的正統「中華民族」身分，此種認同凝聚精神力量，建構與維持了移居後之聚落與社會架構。作者引用醫學人類學者凱博文（Arthur Kleinman）「社會痛苦」（social suffering）理論，說明雲南華人因戰爭而流離失所，充滿苦難之集體記憶在輾路藍縷過程中，意外銳化（頁219）成極端、強化的民族主義與鄉愁，成為離散人群精神寄託與為生存奮鬥的力量。

終於在移居社會站穩腳跟、建立起可靠生計模式與社會秩序後，儒家思想成為其投射、具體化民族認同之客體，標示的並非具實體疆界與政府組織的華人政體，而是「文化中國」（頁219）。作者針對美弘村民心理有如下分析：

與泰國民族國家的相遇，似乎反而增加了他們對自身文化遺產的危機感。而這種危機感，在軍隊的組織架構與反共的意識形態下，更形成了對於維護傳統的堅持與實作……「中國人」的標籤成為象徵資本，雲南華人藉此確認自己的身分，以支撐及合理化他們在泰國邊境的邊緣存在。（頁157-158）

時光更迭，經歷二十世紀下半葉冷戰結束與地緣政治劇變，飽嚙顛沛流離、跨國移動生命歷程的第一代雲南華人，並未融入泰國社會。懷揣對中國共產主義、經過政黨輪替之臺灣政府、泰國腐敗官僚的不認同，轉而追求另一種歸屬標籤：「建構新家園時，他們卻也同時堅持僵化的意識形態，一種不合時宜的『中國性』，藉以維繫逐漸削弱的自尊和認同」（頁203），卻又使其於華人社群與泰國社會中，愈形邊陲與孤立，「使他們成為真正的『失落』的一代」（ibid.）。作者於本書導論將此現象、過程理論化，以「文化僵化」稱之，並闡述明確定義。在此不完整引述，邀請讀者親自浸淫書頁中。

第二、三代泰國土生土長之美弘村民，則耳濡目染相對多元、有彈性的價值觀，

異質「永續」敘事：讀《借土養命：從雲南到金三角，從毒品到永續農業，一個泰北華人社區的民族誌》

長輩秉持之文化慣習對其不再理所當然。有人奮起挑戰村內寡頭政治，也有人選擇離開，逐漸融入泰國主流社會，甚至移民世界各地追尋機會與他種生活模式。第四章提及，年輕一代雖接受村中華文教育，對儒家遺產之態度與詮釋已與長輩截然不同。他們成為務實、「策略性的文化參與者」（頁 204），手握「彈性國籍與認同」（ibid.），運用從華文教育體系習得之語言能力、金錢敏銳度、辛勤工作性格、人際關係手腕，擴展就學與就業機會。華人文化對其而言，是可轉換為經濟、社會、文化資本之象徵資本，得以藉此晉升專業階層，進入跨國貿易網絡，拓展婚配對象選擇，甚至移民。世代矛盾、社群分裂、年輕人外流甚至放棄泰北華人標籤，都使美弘村「永續發展」面臨困境。

美弘村恪守儒家社會秩序雖使村民得以於流徙地開創新生活，卻也導致社群固守價值規條、軍方階層、性別角色，壓縮個體適性發展與生存空間。第三章提及，聚落逐漸成形、生活上軌道後，村內創建華文學校，除教授數學、英語、電腦等有利就業之科目，教科書亦涵蓋中文、儒家思想與公民道德。學校之外，藉由編纂族譜、實行父系大家庭組織、強化女性從屬劣勢、舉辦歲時祭儀與生命儀禮，複製孝道家庭價值與父權社會結構。遭遇內部矛盾時，透過詮釋「正統」，重申既有觀念與制度形式上之權威與自我優越感，壓制異議，阻礙創新與變革。加乘愈趨複雜之財富與族群差異，看似和諧的村子中，衝突日漸白熱化。

對美弘第一代村民而言，社會痛苦為身分、文化認同之深層、核心原因，尊嚴則建立於對他者的壓迫、貶低、剝削，不僅加諸於群體內弱勢者，也對其他族群、團體施加社會歧視。然而，這些文化慣習亦不免於時光洪流中，逐步「退化成一僵化、充滿怨憤，最後甚至否定自我的社會秩序」（頁 217），難以跨世代延續。

跨世代延續困境還來自於全球化情境。「全球化將導致民族國家消失」為 2010 年前常見宣稱，但本書作者持不同看法。脫離冷戰時期，進入人類歷史又一波全球化時代，美弘年輕一代村民感到民族主義成為社會痛苦根源，族群身分連結早年泰北華人移民製毒、販毒印象，使其急欲擺脫祖上背景，樂於成為相對不保守、壓抑、性別歧視的泰國公民，或歸化臺灣等提供其向上流動機會之主權、政治實體。²

即便年輕一代認為公民身分、國族認同對其而言是流動、過渡性、有條件、多重的，不受儒家思想與道德約束，端看哪一種方案可使個人獲得想要的生活，但作者指出，此種因時、因地制宜之務實作法，並未從根本上挑戰「民族國家作為『處理社會過程的容器』的存在事實」（頁 227），其選擇仍然奠基於民族國家概念，以此為前提，方

能確立自身社會身分。最終，離散人群成為移居國公民，雖經歷跨國流徙、族群身分雜糅，離散人群原鄉（中國）與移居地（泰國）之「民族國家」仍屹立不搖，此概念並未失效。最受衝擊者為第一代離散人群，其永續經營理想社群的夢想，在後代子孫不再關心文化認同、社會制度、生計模式能否永續後，被連根拔起。

下文，筆者以讀者與相關領域後學觀點提出幾點觀察，期待與作者對話。首先，筆者認為本書特別動人之處為作者於書籍尾聲的翩然現身。作者回憶自身長輩、居住地、語言、教育背景，闡述個體生命經驗如何使其與雲南華人離散社群多有共鳴，並因此對「故鄉」意義產生質疑；同時，梳理出即便於全球化時代，個人身分認同仍需仰賴民族國家錨定。此處適切地回應了本書前半段對民族誌書寫之反思，作者點出，檢視人類學家、田野工作者主觀視角，可洞察研究人員之學科訓練、道德原則如何影響研究成果。因此，研究、分析、評估美弘村民行為及其生計方式之經濟、社會、環境影響前，須反思、甚至於研究報告中明言書寫者立場、動機、價值觀。基於此觀點，筆者不免留意到，書中多處對比香港，但並未解釋比較基礎、動機，乍讀之下，偶有天外飛來一筆之感，隱隱察覺香港可能是作者心中之比較基石，卻未參透其中義理。即便書中跨文化比較尺度為全球華人，作者引用文獻時兼顧多地華人移居社群，然提及非香港案例時，多停留於理論思辨，較少述及民族誌細節。直至作者敘明自己曾居香港、廣東話名列第三個學會的語言時，筆者才理解，香港在書中高頻率地出現，除因此地為眾多華人研究重要理論發源之田野地，亦因此處是震盪作者生命、留存心中的一方天地。

其二，作者對美弘第二、三代村民有獨到、細緻之統整性結論，成功引起讀者瞭解這群人的興趣。若能提供更豐厚民族誌資料支持論點，可滿足讀者求知欲外，也將增加本書此部分之精細度與說服力。具體而言，作者分析美弘村年輕一輩，認為其對於族群、文化、政治意識型態興趣已不高，亦不具有其長輩因離散經驗而獲得之全球跨境視野，更重視個人主觀生活需求，例如完成學業、經濟獨立、成家立業。作者評述，如此的主體性並未超越自身經驗與視野侷限，無心也無力建立跨國、具公共意義之華人社群。作者認為，此現象將挑戰全球化理論者之預測。然而，書中對於年輕一輩之描述篇幅有限，第一代村民被賦予清晰身影與話語，第二、三代則相對面目模糊、同質性高。

其三，田野調查策略與研究倫理考量，是書中著墨不多、但對於理解全書脈絡與理據十分重要之資訊。作者書寫技巧嫻熟、圓潤，用恬靜、恰到好處、可讀性高的筆

異質「永續」敘事：讀《借土養命：從雲南到金三角，從毒品到永續農業，一個泰北華人社區的民族誌》

調，刻劃當地看似和諧無波，實則暗潮洶湧之關係動力；行文間不仰賴形容詞、價值判斷類型、情緒性措辭，民族誌卻因詳盡陳述田野工作所見所聞而遒勁有力，平靜卻擲地有聲地呈現了田野地不那麼光彩的一面。然而，這恐怕是所有田野工作者、人類學家不斷面臨的兩難：與研究參與者發展出了信任與合作關係，總帶著受益於研究參與者的感激之情與必須有所回饋的責任感，甚至試圖回應田野工作者應「隱惡揚善」的期待。此情況下，是否應揭露可能使當地人感到受批判的內容？人類學家應該「為報導人喉舌」，還是詳實敘寫經驗資料並提出分析、理論？哪一種作法才對得起學術研究之社會責任？簡單的做法是取得兩者平衡，但取得平衡是否可能？或許永遠沒有能說服所有人的答案，但筆者認為，本書已縝密地說出了當地人、事之多面、複雜，而這或許才是人類社會的日常樣貌。³ 若作者能更多說明研究方法論及書寫策略，便能邀請讀者主動判斷是否被作者說服，亦分擔壓在學術著作書寫者肩頭上的研究倫理與社會責任重擔。整體而言，本書除理論貢獻，亦為泰國華人社群不同世代生命軌跡留下珍貴紀錄。

附註

1. 筆者論文可參考何浩慈（出版中）。〈農耕實踐與人地關係跨域連結：臺灣原住民社群與香港青年〉。《思與言：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》。張夏準著作可參考 Chang, Hajo, ed. (2003) *Rethinking Development Economics*. London: Anthem。
2. 書中說明，1980 年代的中華民國政府亦施行幾項措施，協助雲南離散人群適應泰北移居生活。其一，視雲南民兵組織為中華民國政府軍附屬軍隊，提供退撫津貼與醫療、健康照護。其二，提供經濟、技術、基礎建設援助，包括架設自來水與淨水系統、鋪設街道、引進新品種及生產技術、教授製作紀念品以售予觀光客。其三，1960 至 1990 年代間，接受泰北雲南華人子女至臺灣就學，年輕人完成學業後於臺灣就業、定居，定期匯回村里之款項，使部分村民有了穩定收入。離散人群逐漸邁向落地生根、安居樂業，甚至創立華文學校，供村內學子就學外，亦吸引泰國主流社會其他成員前來。
3. 書中有許多關於不同社會階層互動之生動、豐滿描述：上位者（軍官、工廠老闆、父親、丈夫）自詡關心、照顧「下屬」（士兵、工人、子女、妻子），並要求後者忠誠與服從。但實際上，上位者時常剝削下屬勞力、財務，甚至迫其從事非法活

動，以滿足上位者需求；而下屬對上位者的不滿與不信任並不當面表達，卻暗地抱怨，甚至用於重要場合對上位者之致命一擊。同時，村民中不乏有人指責當權公眾人物擅權、貪汙、罔顧村民利益、吸毒並從事毒品交易；有時涉及人身攻擊，作者引用資深自治會委員對年輕村長的批評：「你知道他這個人的缺點是從哪裡來的嗎？」隨後楊先生轉身對我說：「就是從他那個低階士兵的父親和不識字的傜族母親那裡來的！」（頁 187）。書中回顧，美弘村全體村民曾有機會在 1981 年即獲得泰皇大赦授予泰國公民權，但指揮官李文煥將軍卻拒絕了此次機會，只因擔心村民成為公民後移居清邁、曼谷等地尋求更好的生活將使美弘村敗落。最終僅有軍人及近親獲得公民權，其他人只被授予居留證明。